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姜义华
编

章太炎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姜义华
编

章太炎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章太炎卷/姜义华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0-19390-8

I. ①中… II. ①姜…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章太炎 (1869~1936)-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7081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章太炎卷

姜义华 编

Zhang Taizhan Ju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关村大街 31 号

100080 (总编室)

100080 (邮购部)

100080 (发行公司)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印 张 31.75 插页 2

字 数 507 000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一) 章太炎生平：独树风标的革命者，
继往开来的思想家

一 童年与青年

章太炎，清同治七年戊辰十一月三十（即 1869 年 1 月 12 日）生于浙江省杭州府余杭县东乡仓前镇。初名学乘，改名炳麟，字枚叔。后以“太炎”知名于世。太炎二字，缘于倾慕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其字太冲）及顾炎武而取。他所使用的笔名、别名、别号还有“膏兰室主人”、“章绛”、“西狩”、“台湾旅客”、“穷荒孤客”、“蓟汉阁主”等 20 多个。

章太炎出生之时，正值“同治中兴”。清王朝在倾其全力平定太平天国与捻军之后，借助于办“洋务”，使统治秩序渐次恢复。经历十多年战乱，全国人口锐减，大量土地荒芜，急待招徕户口开垦，人口膨胀与耕地有限的矛盾得到暂时缓和；小农的普遍增加，永佃制在江南的推行，为农业和农村的复苏提供了契机。结果，清王朝深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的总爆发被延缓了 30 多年。章太炎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

章太炎的家庭，乾隆、嘉庆年间曾一度显于乡里。太平天国战乱期间，家道急遽中落。他的父亲章濬曾做过杭州知府谭钟麟的幕僚，后返回余杭任县学训导，后因卷入仓前镇轰动一时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被革职闲居在家。仕途不利，章濬恬淡之中，常常又夹杂着一丝郁郁不得志的情绪。章太炎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能够较为安定地接受教育，而同清王朝及当时炙手可热的湘淮军统治集团保持了相当一段距离。

章太炎4岁就学识字，7岁后从外祖父朱有虔接受了非常严格的朴学基础教育和基本训练。朱有虔出身于海盐汉学世家，本人对汉学也很有修养，课读小外孙，非常尽心，使章太炎童稚时代便受到了朴学的正规启蒙。

11岁时，外祖父返回海盐，章太炎改由父亲亲自督教。章濬课以律诗及科举文字，3年后即命章太炎赴县城参加童子试。章太炎因患癫痫症未能终场。其后便废制义不为，专心研究文字音韵诸学。担任县学训导不久又中举的长兄章炳森对章太炎的学业非常关心，指导他刻苦攻读许慎的《说文解字》、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顾炎武的《音学五书》、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等一批文字音韵学方面的权威性著作；章太炎还通过仔细研读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等著作，得识如何充分运用文字音韵学知识诠释经文、疏解经义。在这一扎实的基础上，章太炎通读了汇集清代经学研究之大成的《学海堂经解》与《南菁书院经解》，共二千八百余卷，对清代朴学研究的成果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1890年，章濬去世。章太炎离家至杭州入由俞樾主持的著名学府诂经精舍，埋首苦读近8年。章太炎师事俞樾，培养了研治群经和诸子的浓厚兴趣。他在精舍期间，还虚心向谭献、黄以周、高学治等一批卓然成家的学者问学，在他们的影响下，从专门模拟秦汉文风转向崇尚魏晋文章，从只言片语的考订转向注重古今各种典章制度及其沿革的研究。

就思想渊源而论，章太炎在这一时期最为重视的是传统的史学与子学。《春秋左氏传》，杜佑的《通典》，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及老子、庄子、荀子、韩非的著作，对他影响极深。这时，他也开始接触西方若干学说。从译成中文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侯失勒《谈天》、雷侠尔《地学浅释》等书中，他接触到近代西方天体演化学说、生物进化学说、细胞学说、物质构成的元素与粒子学说。从其他译书与刊物中，他还接触到外国历史与西方哲学、社会学。传统思想与西方这些学说推动了章太炎自具特色的学说见解的形成。

章太炎在诂经精舍期间撰写的第一部著作是《膏兰室札记》。原稿分装4册，以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写成，以他读书著述的一方斗室名称题名。这是一部仿效《读书杂志》、《诸子平议》的著作，以诠释考辨诸子著作为主，兼及经、史，其中一个重要特色，是运用了不少他当时所知的西学知识。

《春秋左传读》是章太炎精舍期间用力最勤撰成的一部 50 万字的著作，原题《春秋左传杂记》，共有 900 条，分作 9 卷，解释《左传》中文字、典章、名物，疏证《左传》体例、论旨，辨明《左传》作者、撰著与传授的过程。有清一代，专门研究《左传》的鸿篇巨制极少，章太炎运用自己广博的知识和熟练的方法，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正当章太炎潜心著述之时，边陲警报迭起，民族危机日渐深重。当甲午海战的隆隆炮声响起的时候，西子湖畔的宁静书斋便再也平静不下去了，章太炎的生活历程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 从革政到革命

甲午战争失败，大片土地被割让，大笔赔款要支付，“洋务”竟不堪一击，“中兴”重新为危机所取代。章太炎深深感到，这是一个“大群之将涣”的时代，他尽管只是一名“越之贱民”，生又羸弱，“目睹其肢体骨肉之裂而不忍，去之而不可，则惟强力忍诟以图之”^①。他针对现实重读史著与诸子著作，“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②。荀子法后王，尊荀也就必然注重研治西学。为此，他同主张尊崇孟子及法先王的老师俞樾产生了分歧。1895 年 11 月，康有为在上海发起建立上海强学会，团结南北之通人志士讲求新学。章太炎见到章程后，立即报名入会并捐款支持，这是他首次表示同发动公车上书、积极鼓吹维新变法的康有为站在同一战线上。

随着维新运动渐次开展，章太炎越来越不甘于“终日枯坐，与蟬鱼相对”^③。1897 年初春，他欣然接受了上海《时务报》经理汪康年的邀请，不顾俞樾的劝阻，离开了诂经精舍，到这家维新变法最重要的宣传中心参加编撰工作，发表了《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等文，被谭嗣同称为“真巨子也”^④。但为时未久，他就因为不愿附和康有为尊孔设教的主张，同主持报馆工作的康门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发生冲突，被梁启超的学生梁作霖当众羞辱殴打。章太炎不愿因思想学术上的分歧导致政治上的分裂，为避免事态扩大，主动离开了时务报馆。

① 章太炎：《明独》，见《榘书》初刻本。

② 章太炎：《蒟汉微言》，见浙江图书馆刊《章氏丛书》本第 72 页。

③ 章太炎：《救谭献书》（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日），上海图书馆收藏。

④ 谭嗣同：《致汪康年、梁启超书》，见《谭嗣同全集》第三七一页。

章太炎返回杭州，但没有返回诂经精舍。他起先着手撰写《〈新学伪经考〉驳议》，后来考虑到这样做会因康有为威望受损而削弱共同致力的维新政治运动，接受了孙诒让的劝告，中止了这部书的写作。

为推动浙江维新变法运动，1897年6月，章太炎同宋恕、陈虬等人联名发起成立了兴浙会，要求以浙江历史上五位著名英雄刘基、于谦、王守仁、黄宗羲、张煌言为楷模，振兴浙江，进而振兴中国与亚洲。他企图将兴浙会办成一个政治性团体，特别标榜奋勇抗击异族统治、积极规复华夏故鼎的历史人物，表明他已隐隐将振兴中国与维护清廷统治区别开来。《兴浙会章程》要求根据荀子法后王精神研究西方格致、政法诸学，对传统思想，以研治周礼、汉唐历史及管子、墨子之学为主，反映了章太炎这一时期治学的基本倾向。

兴浙会筹组未久，1897年8月初，章太炎又与宋恕、陈虬等创办了《经世报》，并试图使之成为兴浙会的机关刊物。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变法箴言》一文，比较系统地正面阐述了他对维新变法的见解。章太炎认为，应当同时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醉生梦死，无视国家深重危机，继续抱残守缺，鹜心于教派之争；二是看改革之业过于轻易，“见西法之效，以为驰骋上下，无曲折可以径行也”。他指出，前一种倾向将会使士气愈萎靡、民志愈涣散，国家“求再亡、三亡而不可得”；而后一种倾向，以为借一纸法令，中国就能够立即开议院、立民主，那只能导致无政府状态泛滥，甚至域内抢攘、流血漂橹。就建立民主政治而言，他强调：“学堂未建，不可以设议院；议院未设，不可以立民主。”为此，中国维新变法必须具有“趣死不顾”的决心，而又认真注意民众觉悟程度和新旧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准备走一条曲折之路。“憔悴竭思，斟酌西法，则而行之。”为促使民众觉悟，他主张在维新宣传与教育中“必合中西之言以喻之”，分别不同对象，或重在“道今”，或“委蛇以道古”。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显示了章太炎维新变法运动中的基本立场。

章太炎对清王朝率直的批评，特别是他经常流露出来的反满民族情绪，使兴浙会中的许多成员感到不安。他们要求修改《兴浙会章程》，改变兴浙会倾向，《经世报》一部分同仁也支持他们的要求。章太炎愤而退出兴浙会，并辞去《经世报》总撰述职务。

根据针对不同对象或倡导复兴故物、或径直介绍新知的方针，章太炎1897年8月与王仁俊一道创办了《实学报》，11月与恽积勋、董康

等一同组织了译书公会，创办了《译书公会报》。在《实学报》上，章太炎发表了《后圣》、《儒道》、《儒兵》、《儒法》、《儒墨》、《儒侠》、《异术》等一批比较儒学与诸子学短长的文章，用以论证诸子学说可以纠正儒学的偏颇，补充儒学的不足，引导治旧学者脱出儒学樊篱。译书公会的任务则是专门购求和译介欧美日本“凡有关政治、学校、律例、天文、舆地、光化电汽诸学、矿务、商务、农学、军制”等切用书籍，章太炎作为专任主管，负责确定会报的宗旨、选题、译文润色。

1897年冬，德军强占胶州湾，沙皇俄国军舰闯进旅顺港，一场以划分在华势力范围，进而肢解中国为目标的瓜分狂潮席卷而来。为了挫败德、俄等国的侵略阴谋，章太炎致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李鸿章，建议外交上采取主动行动，利用将威海卫租借给日本，以及广泛聘用日本学者和各类工程技术人员来中国，与日结成联盟，借日本之力抵制德、俄、英、法势力的扩张。“瓜分之形，岌如泰山”，如果继续消极应付，那就会束手待毙。^①章太炎在信中还介绍了自己的学历、志向，期望得到李鸿章的器重，但上书以后，如石沉大海，李鸿章对他的建议未予置理。

1898年初，湖广总督张之洞致电章太炎，邀请他赴武昌担任即将创办的《正学报》主笔，并派幕僚钱沅至沪迎接。4月初，章太炎到达武昌，发现主持《正学报》创办事宜的是张之洞的亲信梁鼎芬，他们企图利用章太炎反对建立孔教，把《正学报》办成一个反对康有为的刊物。正在这时，张之洞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代表作《劝学篇》由两湖书院刊刻问世，内篇鼓吹保国保教保种，外篇讨论引进西学西制，全书中心是效忠清廷。这一切，使章太炎深为失望。他为此同梁鼎芬等人发生多次正面冲突，在武昌只待了一个月，便乘舟东下。

章太炎返沪不久，光绪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了“百日维新”。1898年7月26日，《时务报》奉旨改为官办，汪康年乘机改刊名为《昌言报》，并聘章太炎为主笔。章太炎密切关注着京中政局的发展。结局很快就出现了：慈禧发动军事政变，光绪被软禁，康有为、梁启超仓皇外逃，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屠戮，腥风血雨笼罩了中国大地。章太炎对清王朝统治集团自我变革是否可能由来已久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他悲愤地撰写了《祭维新六贤文》，痛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动势力；他还以“日本西狩祝予”的假名在《昌言报》上发表了《书汉以来

① 参见章太炎：《上李太傅伯相书》，上海图书馆收藏。

革政之狱》，对汉唐以来多次改革运动失败的原因作了总结；并暗示康有为、谭嗣同等尽管被强加了各种罪名，但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其事虽不获平反于当时，而未尝不平反于后世”。

不久，章太炎被列名通缉。他在上海已立不住足，经亚东时报馆日本人安藤阳洲等介绍，1898年12月到了日本占领下的台湾。

先前，章太炎尽管对清王朝深为不满，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较为和平的“革政”来达到改革的目标，避免采用激烈的革命手段。面对慈禧太后所发动的军事政变和“六君子”的惨遭杀戮，他自白“至此亦悟无兵仿者之不能变政矣”^①。但是，对于是否只有革命一途，他心中尚存疑虑。在台北，他应聘担任《台湾日日新报》特约撰述，在该报发表了数十篇文章，揭露发动政变的元凶那拉氏及助纣为虐的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罪恶，对逃避在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表示积极声援。康、梁的政治见解这时对他仍有相当影响，特别是革命将引发内乱，导致列强干涉和瓜分危机的论点，成了他走向革命的严重障碍。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矛盾惶遽的状态下，他提出了“客帝”与“分镇”两项主张。

客帝一语，脱胎于古之客卿。章太炎认为，凭清王朝统治的种种罪恶，进行反满斗争的正义性是无可怀疑的。但一面有“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的外部威胁，另一面又有光绪皇帝椎胸啮臂以悔250年之过，并决心变革故法以御白人之侮的内在因素，不攘逐满人又是必要的与可能的。这互相冲突的两种政治方略怎样才能统一起来呢？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光绪皇帝“引咎降名，以方伯自处”，主持实际政务，身份犹如向国外聘来佐理政务的客卿，而虚尊孔子为“中夏之共主”^②。这样，至尊的帝号归之于汉人，但又非实体；光绪皇帝可以变法，但他又只是一名权力较大的长官；反满与不攘逐满人两种要求便都可得到满足。

分镇，是在中央政治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将全国分成6个大区，燕、齐、晋、汴及东三省为王畿，由朝廷直接统辖，关陇并附以新疆、楚蜀并附以西藏、滇黔桂、闽粤、江浙等各以其督抚治理，行政署吏惟其所令，每年上交朝廷数十万贡银。“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③

① 章太炎：《致汪康年》（己亥正月初七日），上海图书馆收藏。

② 《客帝论》，见1899年3月12日《台湾日日新报》；《清议报》第十五册（1899年5月20日出版）。又见《馯书》初刻本《客帝》；《馯书》修订本《客帝匡谬》。

③ 章太炎：《分镇》，见《馯书》初刻本。

然而，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很快便粉碎了章太炎所精心设计的这两个方案，并使他对康有为等从期待转为深深的失望。对日本朝野较为深入的了解，也使他认识到先前寄期望于日本支持中国抗击西方各国是多么幼稚。

台湾处于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之下，章太炎在这里首先较为直接地尝到了亡国之民的滋味；因此，他对于日本治台政策经常猛加抨击。他终于无法在台继续待下去，决定赴日游历与考察一个短时期后即秘密回国。1899年6月，他到达日本，会见了梁启超，并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在这里，他看到许多高唱维新的流亡者竟热衷于争名逐利，非常气愤，怒斥他们“蛙蛭思转丸，茅鹑惟啖肉；新耶复旧耶，等此一丘貉！”^①

1899年8月底，章太炎秘密返回上海，后为逃避清廷耳目，又潜回浙江。他一面将自己论学论政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馗书》编定付梓，一面寻找机会将自己提出的客帝与分镇方案付诸实施。1900年1月，慈禧太后宣布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准备废黜光绪皇帝，立溥俊为帝。这一计划虽因各国驻华公使拒绝给予支持而搁浅，却将光绪的懦弱与毫无实力裸露于世。依靠这样的客帝来进行改革、抵御列强显然很荒唐。1900年夏，义和团控制北京，慈禧太后决定对列强宣战，列强组成八国联军进津京地区，南方各省督抚为安定列强之心，宣布“东南互保”。章太炎以为实施分镇方案时机已到，写信给两广总督李鸿章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要他们“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②。但是，李鸿章却北上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坤一也继续效忠清廷。章太炎在《馗书》刻本上写下一段自责的批语，说上述客帝、分镇等主张都是“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③。随即，他又分别写了《客帝匡谬》与《分镇匡谬》，说明“满洲弗逐，欲土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分镇属“借权之谋”，但事实已证明，“今督抚色厉中干，诸少年意气盛壮，而新用事者，其蕙畏又过大耄旧臣”，这就表明：“夫提挈方夏在新圣，不沾沾可以偷取。”^④

正在这时，严复、容闳、唐才常等人联络在沪各方面人士于1900

① 章太炎：《西归留别中东诸君子》，见《清议报》第二十八册。

② 章太炎：《庚子拳变与粤督书》，见《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二号。

③ 《馗书》（木刻本）章太炎手批本，上海图书馆藏。

④ 《客帝匡谬》、《分镇匡谬》，俱见《馗书》，东京翔鸾社1904年4月版“前录”。

年7月26日在上海愚园正式建立中国议会，确定宗旨为“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平内乱”、“保全中国自主”、“推广支那未来文明之进化”^①。章太炎参加了成立会，对于唐才常等所坚持的起兵“勤王”的主张极为不满，为此，给中国议会专门写了一份说帖，强调“本会为拯救支那，不为拯救建虏；为振起汉族，不为振起东胡；为保全兆民，不为保全孤愤……若模棱两可，阴有所覬，徒托斗智斗力之辞，坐忘畏首畏尾之害，则国非吾国，民非吾民，虽保安全壤，仍与曾、胡之徒同符共轨”，并明确表示自己断然退出，以示抗议。^② 随即，8月3日，他又毅然剪去作为忠于清王朝标志的长辮，不再穿清朝服装。他并挥笔写了《解辮发说》，公开宣布同清王朝完全决裂；致书孙中山，表达了他无限仰慕的情感和自己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他终于克服了所有疑虑，走上了革命道路。

三 七被追捕，三年禁狱

章太炎第一次被通缉追捕，是在戊戌政变之后；第二次被追捕，是因为慈禧太后立溥俊为大阿哥时，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各省寓沪绅商1200多人急电北京反对逼迫光绪退位，章太炎也被经元善列名其中，慈禧太后恼羞成怒，下令缉捕经元善与其他列名者，章太炎不得不走避。1900年8月唐才常发动自立军起事失败，清廷悬赏缉拿列名于中国议会与自立军的成员，章太炎第三次成为被指名追捕的要犯。相隔数月之后，事态有所缓和，他返回余杭乡里度岁。农历正月初一，他获悉追捕者即将到达，原来他又因《诂书》初刻本问世而第四次被缉拿。他在一座寺院中躲避了10多天，潜回上海，借住在朋友吴保初家中。

这时，章太炎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持的保皇主义，只反对慈禧太后而不反对整个清朝统治者，将中国革新强盛的希望寄托于光绪皇帝重新执掌朝政，已经成为妨碍人们走向反清革命的重要障碍。为了击破人们对光绪皇帝的幻想，章太炎撰写了《正仇满论》，发表于在东京出版的《国民报》第四期，论证包括光绪本人在内的整个满族统治者绝不可能放弃他们的权力、地位与既得利益，他们所有作

① 孙宝瑄：《日益斋日记》庚子七月初一日，上海图书馆藏。

② 参见《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及下述《解辮发说》、《来书（至孙中山书）》，俱见《中国旬报》第十九期。